ISSN：3105-0085
EISSN：3105-0093

在宁中国台湾省同胞的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构建研究

吴颖欣 罗静芬 冯启金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本文基于布迪厄资本理论，采用访谈法、文献法与观察法，聚焦在宁中国台湾省同胞的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构建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台胞来宁的核心驱动力包括事业发展、亲友联结及个人体验需求，而南京与中国台湾省在生活环境、政策服务、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场域差异构成适应难点。台胞的社会适应本质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跨场域重构与相互转化过程。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构建过程对南京社会文化经济融合、群体互动及台胞个人生活职业重塑产生多维度影响。

关键词：在宁中国台湾省同胞；社会适应；归属感；资本理论

DOI：10.64649/yh.shygl.issn3105-0085.202603014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中国台湾省同胞（以下简称“台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据统计，在祖国大陆居住并接受普查登记的中国台湾地区居民近 15.79 万人，其中，南京与中国台湾省渊源深厚，自 1988 年首个台资项目落户南京至今，越来越多台胞来宁创业发展，随着在宁台胞数量的增长，研究其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构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中，布迪厄资本理论虽被应用于移民研究，但鲜有将其作为核心框架，系统剖析台胞跨场域迁移中经济、文化、社会、象征资本的转换路径，以及资本运作对其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构建的影响，这也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切入点。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文化融合、社会适应以及归属感等，综合相关研究，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其一，文化融合是指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其传统文化为基础，根据需要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来促进自身发展的过程[1]。对在宁台胞而言，文化融合并非单向同化，而是在中华文化共同底色基础上，实现中国台湾省地域文化与南京本土文化的双向调适。其二，社会适应是指能够适应新场域的社会环境，并具备从这一环境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自身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2]。其三，归属感则是个体对居住地产生情感认同、身份接纳与长期扎根意愿的稳定心理状态，是社会适应的高阶目标。

1 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 2024 年 10 月至今对在宁中国台湾省同胞的深入调查，综合采用访谈法、文献法和观察法。研究系统收集与南京及中国台湾省相关的官方文件、地方志、新闻报道等资料，为研究提供宏观背景和理论支持。并通过深度访谈，本研究以滚雪球方式获取调查样本，深度访谈了 21 名台胞。此外，本研究在台创园内部展开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数据 27 份，作为访谈资料的重要补充。

2 社会适应的产生

依据布迪厄的资本理论，社会适应即通过资本的积累与在场域中的运用，实现自身位置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台胞外来者的初始位置决定了其必须通过对原有中国台湾省场域的资本进行调整，来实现对南京场域规则的适应。为探究在宁台胞社会适应的产生，本文从台胞来宁的原因以及南京与中国台湾省之间的场域差异两方面展开。

2.1 台胞迁移动因

本研究基于推拉理论解析台胞来宁的迁移逻辑，其跨域流动决策是中国台湾省迁出地推力与南京迁入地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揭示台胞跨域流动背后的结构性动力与个体动因之间的复杂交织。

从迁出地推力来看，核心体现在经济制约与社会束缚两方面：一是中国台湾省本土市场规模有限、产业升级空间受限，创业与职业发展存在明显天花板，如餐饮创业者阿吉（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采用化名）直言中国台湾省市场人口基数小，台胞普遍期望依托大陆市场突破发展瓶颈；二是部分台胞尤其是青年群体受原生家庭关系与社会氛围束缚，渴望通过迁移获得个人自主空间，如南京大学台生阿南便将南京作为脱离家长日常监督、实现自我管理的选择。

从迁入地拉力来看，南京的吸引力集中于三大维度，其中事业发展为核心驱动力：其一，南京的市场规模、消费活力与产业集聚效应，为台胞提供了中国台湾省本土难以比拟的发展

ISSN：3105-0085
EISSN：3105-0093

平台，阿羽依托羽毛球专业能力开设球馆、创立运动品牌，完成专业技能到职业资本的转换；其二，产业协作延伸效应显著，如阿供作为台积电设备零部件供应商，随台资企业招商引资项目来宁；其三，社会网络牵引作用突出，亲缘关系成为重要纽带，如阿眷因哥哥在宁工作前来定居。

2.2 台胞迁移困境

宁台两地的场域差异，让台胞在宁的社会适应遭遇宏观制度、中观社会交往、微观日常生活三个层面的递进式难题，三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成为台胞跨制度迁移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宏观制度层面，政策安排的非对称性与行政服务衔接不畅，构成台胞社会融入的结构性壁垒。中国台湾省全民健保制度让当地居民形成了高报销比例、优质服务体验的制度预期，南京现行医疗体系却仍存在挂号周期长、医疗费用高等问题，不少台胞就医时产生心理落差，这正是两岸社会治理模式差异在个体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中观社会交往层面，两地长期形成的沟通惯习差异，成为台胞融入本地人际网络的文化屏障。南京本地人际交往向来直率直接，与中国台湾地区委婉温和的表达风格形成明显错位，有台胞就曾因本地居民的沟通方式产生被冒犯的感受，这也暴露出跨地域交往中的文化误读风险。

微观日常生活层面，气候环境与饮食惯习的差异，直接影响台胞的居住体验与生活成本。有台胞经营的球馆，就因冬季寒冷需要持续供暖，运营成本被直接推高。

3 资本运作下在宁台胞的社会适应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与资本理论，社会空间是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象征资本共同建构的复杂网络，这四种资本形态之间的转换与积累，构成个体在不同社会场域中位置变迁与行动策略的基础。社会适应的本质，并非被动接受既有环境，而是行动者在进入新的社会场域后，通过调动自身携带的既有资本存量，并依据新场域的特定规则进行资本的再转换与再积累，从而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争取有利位置、维持身份连续性的过程。适应是一个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3]。每个场域都有一整套相对独立的逻辑结构，这些规则构成了对行动者开展行动的制约条件和要求，每个入场者必须了解认同、遵照践行，而习得并践行又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本[4]。在此意义上，资本运作不仅是适应过程中的工具性手段，更是贯穿个体社会位置再生产全过程的核心机制。

3.1 经济资本

根据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框架，台胞在进入南京社会场域时所携带的经济资本并非均质化存在，而是呈现出类型分化与规模层级化的特征。依据资本的形成路径与积累模式，可将台胞既有经济资本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其一，产业嵌入型资本，以台积电等大型台企外派人员为代表，其资本依托于中国台湾地区优势制造业的产业链地位；其二，创业携带型资本，以小微型餐饮从业者为主体，具有轻资产、灵活性高但抗风险能力弱的典型特征；其三，家庭转移型资本，以青年学生为核心群体，依托家庭跨区域资源配置所形成的可支配性经济支持。

进入南京场域后，台胞通过就业创收、创业经营等路径实现经济资本的再积累与转换，其资本增殖效率与积累速度受到既有资本结构与本地场域规则的共同形塑。

3.2 社会资本

根据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所实际或潜在占有的资源总和。台胞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拓展，实质上是其突破既有封闭网络、实现社会关系异质化的过程。

在职业场域，社会资本的积累路径取决于职业类型与工作嵌入程度。基础服务型就业者，如奶茶店店员，其社会网络往往局限于同事群体，网络规模小、异质性低，资本增殖空间有限。而创业型台胞，如餐饮经营者，则在与供应商、顾客的商业互动中，逐步建立跨圈层的功能性网络。在公共场域，社会资本的建构依托于兴趣契合与日常互动，如青年台胞通过酒吧社交、乐队演出等亚文化场景，实现与本地同龄群体的文化共鸣与关系联结。

综上所述，台胞在南京社会场域中的社会资本运作，呈现出从强关系主导的封闭网络向弱关系嵌入的开放网络演进的动态过程。

3.3 文化资本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其划分为具身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形态，这三类资本构成台胞认知并立足南京社会场域的核心资源。台胞携带的中国台湾省本土文化资本，在南京场域中经历的转换、再积累与各类困境，既折射出两岸文化层面的深层结构错位，也凸显了台胞跨场域迁移面临的象征性挑战。

在具身化层面，近半数台胞的大陆祖籍背景，因血缘与历史记忆形成的先赋性文化资本，让其对南京场域更具文化亲近感与融入意愿。

在客观化层面，阿吉、阿红经营的中国台湾省小吃等特色饮食，既是物质商品，更是承载中国台湾省饮食文化与制作技艺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台胞创业者将其塑造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以中国台湾省味为符号在南京餐饮市场开辟独特生态位，本质是将中国台湾省地方饮食这一边缘性文化资本，在南京主流场域中重新估值、策略性运作，以此获取经济利润与社会

ISSN：3105-0085
EISSN：3105-0093

承认。

在体制化层面，台胞面临着最具结构性的资本转换困境。体制化文化资本依托权威机构授予的学术资格、职业证书，其价值高度依赖场域内的制度性认可。一方面，港澳台联考制度为台生进入南京高校提供了渠道，成为台生群体获取本地体制化文化资本的起点；另一方面，两岸资格认证体系的壁垒，让台胞原有的体制化资本大幅贬值。

3.4 象征资本

依据布迪厄象征资本理论，象征资本是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经特定场域认知承认后，以符号化形式发挥效力的信誉、权威与声望。在宁台胞的象征资本并非被动等待赋予，而是通过主动的策略性实践完成再生产，以此谋求南京场域的合法性承认，核心有三条路径：

一是文化叙事的象征调试。阿吉在店铺悬挂两岸一家亲标语，以“中国台湾省人在大陆”的视角创作自媒体内容，将中国台湾省元素与南京主流话语框架策略性缝合。二是社会信任的象征沉淀。阿度因创业故事获媒体报道积累知名度，又以温和友善的经营风格收获本地顾客与网友的正面评价，提升了该群体在本地社会的象征价值。三是体制化资本的象征转化。阿羽在清晨杯羽毛球赛事中的优异表现获得官方媒体关注与报道，将赛事成绩这一体制化资本转化为知名度、公众认可等可流通的象征资本，进一步提升了其在本地社会场域的可见度与话语权。

综上，台胞在宁的象征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中国台湾省人”身份的本地阐释，而资本再生产则依托文化调试、信任沉淀、体制转化三大策略。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台胞的身份符号能否及在何种程度上，被南京社会场域的主导性认知结构与权力关系所承认，进而转化为具有实际效力的象征资源。

4 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构建影响

既有研究表明，中国台湾省青年在大陆的社会融入普遍呈现功能性嵌入优先于情感性认同的特征，先实现事业与生活稳定，再逐步形成心理归属[5]。归属感则是个体对居住地产生情感认同、身份接纳与长期扎根意愿的稳定心理状态，是社会适应的高阶目标。在宁台胞的迁移影响，并非单向的个体适应或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一个涉及宏观社会结构、中观群体关系与微观个体惯习三个层面的系统性重塑过程。流动群体社会融入的过程并非沿着经济与身份线性发展的，而是在多维度上同时展开的。这一过程交织着台胞对南京社会的嵌入与南京社会对台胞的接纳，最终指向一个双向融合与深度互构的动态图景。

在这一过程中，台胞既被南京社会所塑造，也在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塑造着南京社会的未来形态。

参考文献：

[1] 强巴央珍，白玛次仁．文化融合视域下西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J].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0 (01): 150−156.

[2] 赵莉．新生代农民工多维性社会适应研究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 32 (01): 126−131.

[3] 严志兰．大陆台商社会适应的共性与差异性——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 [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6(03):5−12+18+112.

[4] 李亚雄，黄子源．场域视角下越南籍劳工社会适应研究——以广西 B 市为例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03):60−69.

[5] 林想，文应威，陈晓刚．哲学视域下居住场所归属感的若干思考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3 (03): 117−122.

作者简介：吴颖欣（2005.10—），女，汉族，湖南长沙，本科，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罗静芬（2004.10—），女，汉族，福建三明，本科，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冯启金（2005.12—），女，汉族，云南昆明，本科，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项目信息：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在宁台胞的社会适应与归属感构建（S202510307110）。